

# 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 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

● 杭侃

昙曜在云冈为北魏太祖拓跋珪以下五帝开凿的五窟（习称“昙曜五窟”）以及因而形成的“云冈模式”<sup>①</sup>，给中国石窟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风流所及，影响到北中国的许多地区<sup>②</sup>。但是，现存昙曜五窟的遗迹并不单纯，五个窟内的造像属于一、二、三期的都有<sup>③</sup>，本文对昙曜五窟中各期的造像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试对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及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进行初步探讨。

为便于问题的引出，这里首先论述第20窟。和平初年（460年），沙门统昙曜奏请“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sup>④</sup>，是为“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第16至20窟。

20窟主尊为结跏趺坐像，俗称露天大佛。从解放前日本人清理窟前遗址的情况看，20窟原先并不露天，也应和其余4窟一样，是主尊占据窟中的大部分面积，具有宽大明窗的马蹄形平面，穹隆顶窟（图一）。20窟西壁的坍塌时间，日本学者推测为北魏以后，辽代以前<sup>⑤</sup>。根据笔者1993年9月对昙曜五窟调查的结果，我们认为

20窟的西壁，应该在第一期西壁胁侍佛完成不久就开始坍塌了。

20窟西壁立佛，现在仅存头光东部最外两层的一部分，立佛的其余部分均已残毁，其残毁的部分，以及20窟西壁与21窟东壁所共有的岩体，都经用现代化学手段进行了加固。此次我们在20窟的西壁，发现一处打破关系（图二~四）。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西N1、西N2两个释迦多宝并坐龕，依其造像风格，开凿于云冈第二期，其中N1主尊着右袒式袈裟，乃是胡服改制前的形制。这两个龕现在也已经残毁，西N2打破西壁立佛头光无疑；而西N1根据残破现状复原以后，也应打破复原后的西壁立佛头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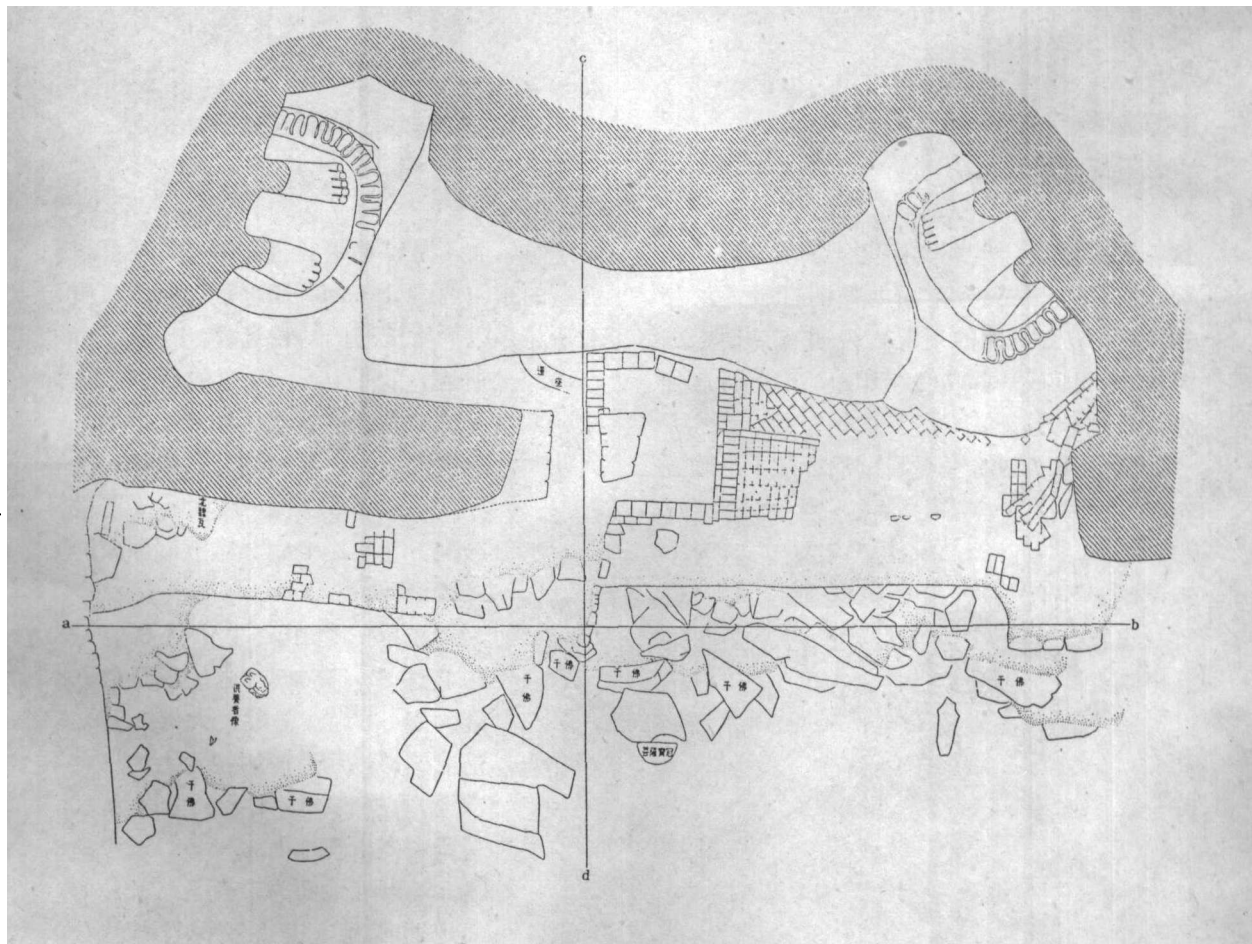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开凿于侏罗纪地层的砂岩体上，岩石以石英、长石为主，钙泥胶结、抗风化能力差，在自然界各种营力作用下，石窟岩体崩塌，雕刻品风化，洞窟渗漏水及岩体壁面淋蚀现象十分严重<sup>⑥</sup>。就昙曜五窟来说，以20窟主尊乳部为界，岩层明显地分为两层（图五），其上为黄色砂岩，其下为紫红色砂岩，这种紫红色砂岩向20窟主尊东西侧延伸，以19窟西胁洞和20窟尤为明

显。现在20窟主尊腹部残毁的部分，以及20窟坍塌的绝大部分（包括20窟东壁与第19窟西胁洞西壁所共有的一部分壁体），都在这层紫红色砂岩上，可见这种紫红色的软弱岩层，对石窟的危害是较大的。昙曜五窟开凿之初，对这种岩体认识不足，可能因石窟自上而下开凿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是石质较好的黄色砂岩层，随后在紫红色砂岩层中进行雕造时，才对这种石质有所认识。

昙曜五窟附近岩体开裂，我们还可以从第18窟明窗西侧上找到痕迹（图六）。从图中可以看出，18窟明窗西侧有一道裂隙，这道裂隙产生后，即用铁质细腰加固，二期的佛龕和千佛，根据这道裂隙的走向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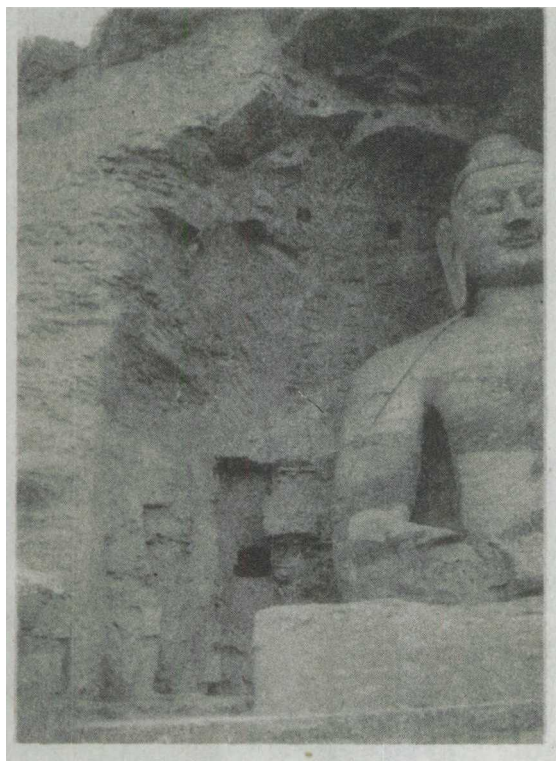
细腰的位置而分布，显然这道裂隙应产生于佛龕和千佛雕造之前，这说明二期佛龕和千佛雕造之前，昙曜五窟附近的山体就已经出现问题。

另外，在紧靠20窟西的21窟，其正壁有一个二期较晚阶段雕的释迦多宝龕。21窟现在的窟底在紫红色砂岩中，但其原来窟底比现在窟底高出几十厘米，恰在紫红色砂岩层之上，仍有遗迹可证（按，21窟石质相当恶劣，即在黄色砂岩层中，仍有软弱夹层，稍触即有剥落。长期以来，21窟窟底不断遭到损坏，以至现在窟底已比开窟之初窟底下陷几十厘米，而下陷后位于紫红色砂岩层中的四壁，仍然残毁严重，目前所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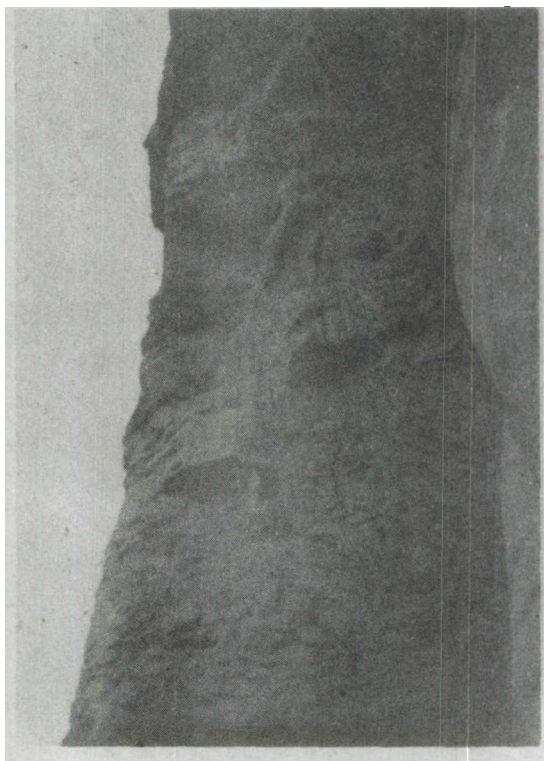


▲ 图一 云冈第20窟窟前遗址发掘

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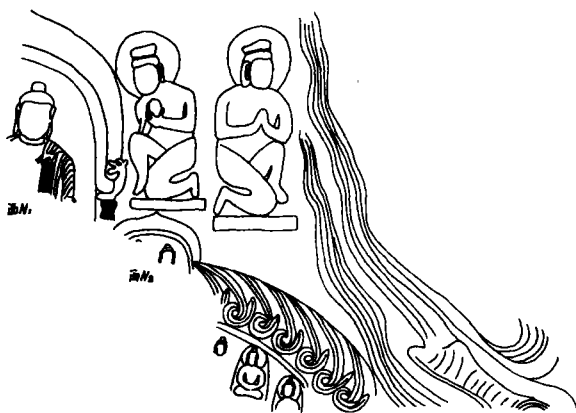
▲ 图二 云冈20窟西壁现状



▲ 图三 20窟西壁打破关系细部

这一部分墙体；也经现代化学手段进行了大面积加固）。结合20窟西壁的打破关系及第18窟明窗西侧的情况，说明在二期，主持开凿云冈石窟者，已经开始考虑避开这种紫红色的软弱夹层了。

云冈第二期的主要洞窟都开凿于昙曜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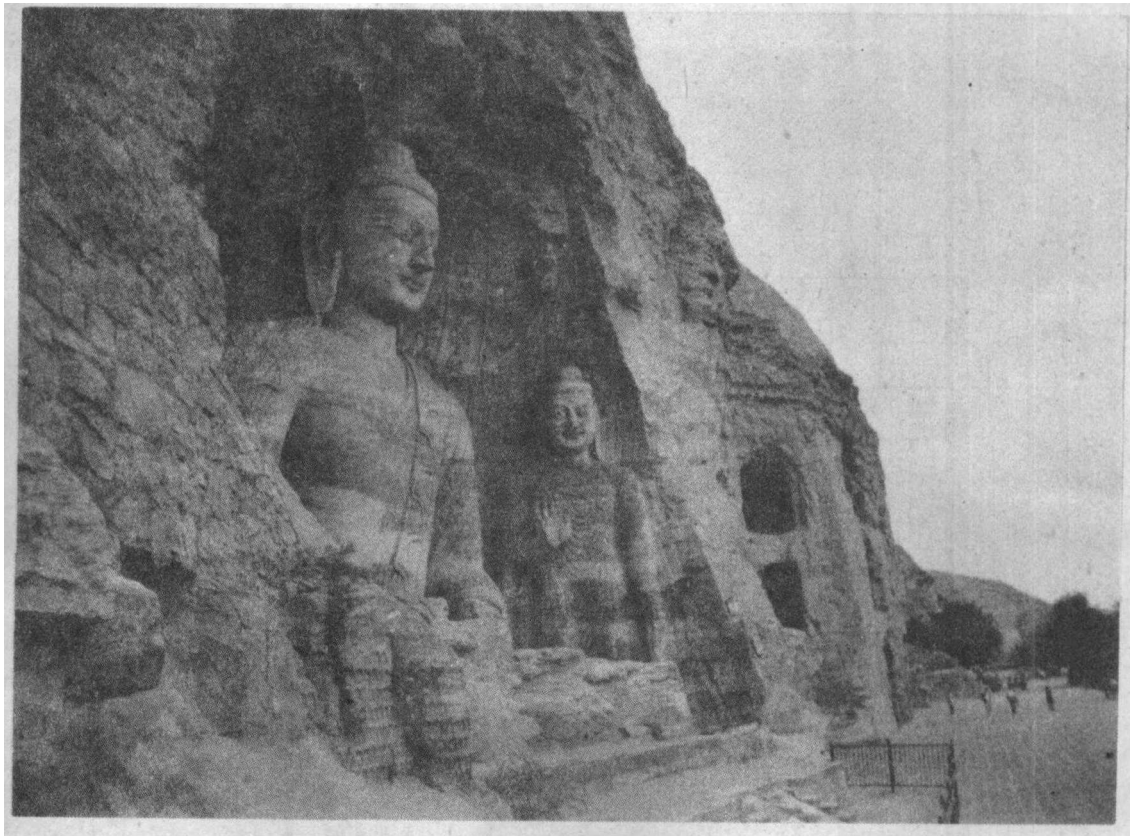


▲ 图四 20窟西壁打破关系示意图

窟之东，而不是以昙曜五窟为中心，在昙曜五窟的东西两侧分布，可能也是对西区石质有所认识以后所进行的一种选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20窟的西壁，在第一期东西胁佛完成不久就已经开始坍塌，而此时两胁佛附近的小龛尚未开始雕造。这种情况，不但对20窟的布局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到昙曜五窟原来的总体设计。

昙曜五窟中，主像最高的是19窟主尊，高16.8米。现在俗称最为宏伟的20窟露天大佛，其实是前壁坍塌后造成的视觉上的一种错觉，它只高13米余。但因为20窟窟底高出地面1米多（以下所述，均以现地面为参考系，开窟时的地面情况，有待发掘材料的公布），这样，从头髻顶端来衡量，它只比19窟主尊略矮一点。18窟



▲ 图五 第20窟岩体分层情况及在佛身上的表现

窟底与现地面齐，而18窟主尊高15.5米，以其头髻顶端计，就约与20窟主尊齐。17窟主像高15米多，但由于其窟底低于现地面1米，这样，17窟主尊地面以上的高度，就只有14米多。16窟窟底与现地面齐，16窟主尊现在通高13.5米，考虑到因二期改建而略有缩小的尺度，可以认为17窟和16窟主尊头髻顶端约略同高，而比18和20窟主尊头髻顶端略低，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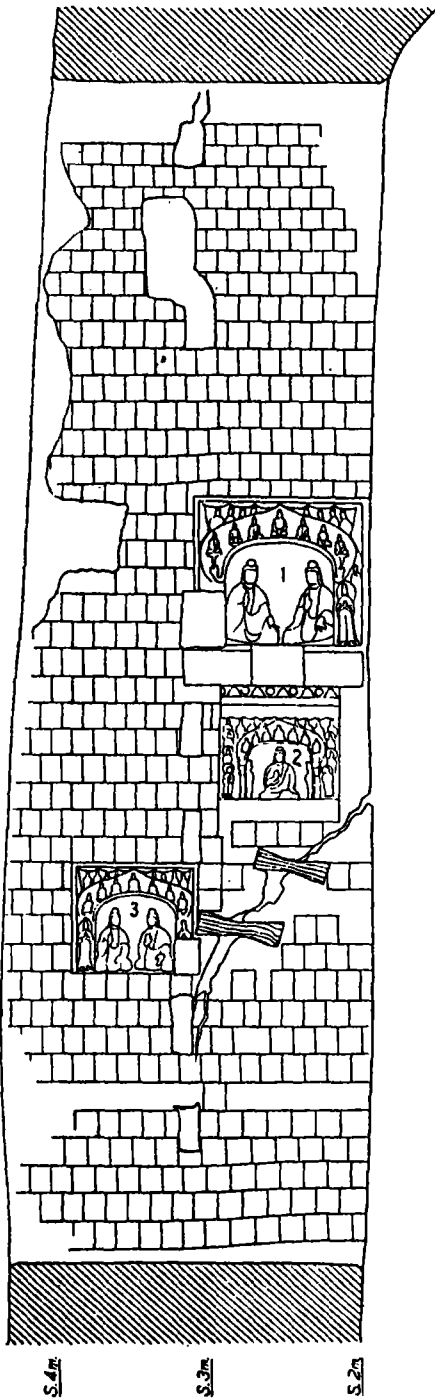
第一，这五尊主像以肉髻顶部高度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从20窟主尊和19窟东西胁洞窟底高于现地面，而17窟窟底又低于现地面来看，这种层次，当是设计者的一种有意安排，目的是为了造成一种主次分明而又富有韵律的视觉效果。

第二，宿白先生曾将昙曜五窟分为两组，18、19、20窟为一组，三窟都以佛装

三世佛为主像；16、17窟为一组，16窟主尊为单一的释迦立像，17窟主像为菩萨装弥勒菩萨，并认为19窟是前一组的中心窟<sup>①</sup>。此次调查所了解到的五个窟主尊在高度上所有意安排的这种层次差别，为19窟是中心窟的说法增加了一个补充的根据。

19窟主洞北壁雕释迦坐像，著右袒式袈裟，内着僧祇支，东壁和西壁上部雕Ⅰ式千佛龕，南壁左右各雕一身较大的立佛，南壁上部除此两立佛外的其余壁面，也雕造同于左右壁的Ⅰ式千佛。另外，在南壁下层的西部有一些二期的小龕和数行Ⅰ式千佛龕，西壁下部有三座二期的楼阁式塔和数行Ⅰ式千佛龕。

按昙曜五窟中的千佛龕，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为论述方便，这里称为Ⅰ、Ⅱ、Ⅲ式。Ⅰ式千佛以19窟东西壁上层千佛龕为代表，形制在三种千佛龕中最大，从衣饰



▲ 图六 云冈第18窟西侧明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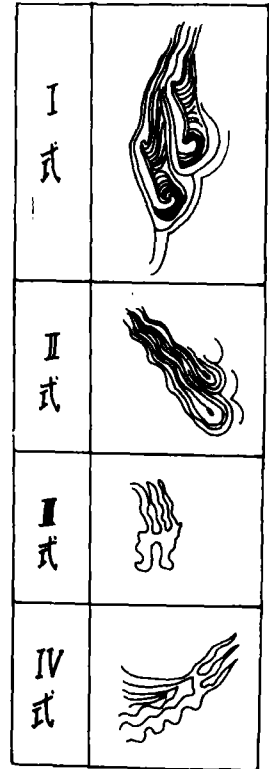
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十二卷

上，可以看出受 I 期主像影响较大；I 式以 19 窟西壁下部和南壁西部下层千佛龕为代表，形制在三种千佛龕中居中，I 式千佛龕分布面积最小；II 式千佛龕以分布于 16 窟至 20 窟外壁的千佛龕为代表，这种千佛龕在昙曜五窟中广泛分布，除窟外壁面，也分布于洞窟明窗，窟门甚至窟内壁面的一部分。III 式千佛龕样式特别，其龕楣呈隆起的弓形，造像形式单

一，形制在三种千佛龕中最小。I 式千佛龕雕造于一期，而 II 式、III 式千佛龕均雕造于 I 期，其中 III 式千佛龕雕造于 I 期的较晚阶段。

如上所述，19 窟主洞内的造像，可以细分为两期，主尊、南壁左右上部的两身立佛像及 I 式千佛属第一期，其余壁面的千佛和小龕均属二期，明窗及窟门部分的雕刻，也属二期。只是在二期的雕刻中，根据造像风格又可细分为二期较早与二期较晚两个阶段，前者受一期影响较大，造像多着右袒式袈裟，后者受胡服改制的影响，着双领下垂式或褒衣博带式袈裟，两者的分界，大约在太和十三年左右。

19 窟东胁洞完成于一期。东胁佛身光的火焰，同 20 窟主尊身光内重 I 式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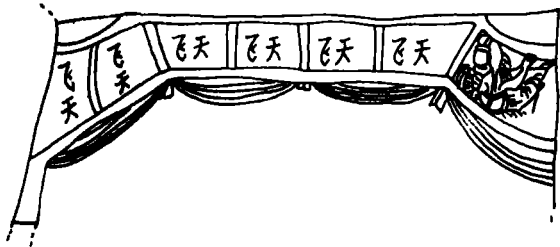
▲ 图七 昙曜五窟火焰式样示意图

而无外重的Ⅰ式火焰。按昙曜五窟主要雕像身光中的火焰形式，可以分为四种（图七）。其中Ⅰ式火焰纹，只见于20窟主尊和19窟主尊身光的最外一重。19、20窟主尊身光的题材布局、造型风格均相近。18窟主尊身光现状只能观察到一个圆形残迹，原状不清楚，但18窟主尊的衣纹风格接近19窟主尊，轻薄贴体，窟中的其他主要雕像一期也已完工，因此，18、19、20三窟的开凿时间应当相近。

19窟西胁洞主像的完工时间，则拖至二期的较晚阶段。主尊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其头部仍然保留一期的造像风格，但其衣纹与身光雕刻均是二期晚段的，其身光外重火焰，已作Ⅳ式，身光内的坐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结跏趺于莲台之上，主尊头部与其他部位的风格，表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别可能说明西胁洞的开凿时间，应当与东胁洞相近，但其头部完工以后，有一段时间的停工。

18窟的情况比较简单，除壁面同19窟一样，插布有一期以后的一些龕像外，五尊主要雕像及东西壁的弟子像，以及上部的Ⅰ式千佛，均完成于一期。

17窟主尊为交脚弥勒，此窟的主要雕像，也完工于一期。主尊身光火焰同19窟东胁洞的Ⅱ式，不见Ⅰ式火焰。其东西胁佛，则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东西胁佛雕于天幕龕下（图八），其身光外重火焰已作Ⅲ



▲ 图八 第17窟西壁天幕形龕

式，火焰尖部不同于Ⅰ、Ⅱ式的一缕和Ⅳ式的三缕，而是分作两股，一股上一缕，一股上两缕。与20窟东胁佛头光相比，多外重Ⅲ式火焰，少内重胡跪供养天。结合17窟主尊之座雕成须弥座式、座上并有狮子雕刻来看，17窟中出现的这些因素，应是17窟略晚于18、19、20这一组洞窟的表现。

16窟主尊为一释迦立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东侧身光尚存有外面三重残迹。自外向内依次为Ⅱ式火焰，胡跪供养天，坐佛，未见Ⅰ式火焰（图九）。主尊的衣饰，则是Ⅰ期后半段的形式。

按照石窟的开凿工序，主尊的身光应稍晚于躯干部分的雕刻，反过来说，身光部分完工了，应可以说明躯体部分也已经完工，即16窟主尊Ⅰ期时已经完工，现状是经过二期后半段改雕而成的。还有两种现象，应该也与改雕有关，其一，16窟主尊在窟内所占的面积较小，与其他四窟中主尊占据窟内绝大部分面积的布局不一致。其二，16窟主尊现在的头部与躯体比例失调，头部所占比例过小。

16窟主尊的改建原因，史料无征，我们只能试图从现状上加以推测。

昙曜五窟中，按毁坏的面积计，以20窟为最，其次就是16窟。在16窟西壁离地面高约2米左右，有一厚三四十厘米的软弱夹层绕窟一周，现在主尊身上，这一软弱层的上下毁坏严重。主尊西侧这一软弱层的下



▲ 图九 第16窟主尊衣饰及东侧身光示意图

部墙体，也崩落一大块。五窟中以风化面积计，则以16窟为最，因此，16窟主尊的改雕原因，可能依然与石质有关。

20窟现存造像，几尊主要雕像完成于一期，其东西壁上部的释迦多宝龕和主尊耳后的4个龕像完成于二期的前半段；19窟主洞内主尊和南壁上部东西的两尊立佛及I式千佛，完成于一期，其他壁面则分别完成于二期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已如前述。18、17、16窟的窟内小龕布局虽然没有19窟主洞内整齐，但绝大部分小龕的续凿，也都完成于二期，三期雕造的小龕，只是个别现象，零星插布于窟内的下部壁面，且体量都较小。值得注意的是昙曜五窟中千佛龕的分布，其I式千佛，在19窟主洞，18、17、16窟内的上部壁面都可以找到；I式千佛分布不广；II式千佛则广泛分布于昙曜五窟的窟外，19、18、17、16诸窟的明窗和窟门左右以及窟内的部分壁面，也都有II式千佛，我们认为这种大面积的II式千佛，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营造，不象昙曜五窟中其他的二期龕像，乃是出于个人捐资雕刻，II式千佛，很可能是昙曜原来的一种设计。昙曜五窟的造像内容以三世佛为主，体现了昙曜欲使佛法流通后世，永存无绝的思想<sup>⑧</sup>，千佛作为一种辅助题材，还与广聚沙门，同修禅定有关<sup>⑨</sup>。I式千佛最初的布局设计，很可能如19窟主洞中的情况，分布于窟内主要雕像的四周，但在I期并未能按原计划全部完成，在随后兴起的云冈石窟第I期开窟造像高潮中，石窟开凿的主体工程在昙曜五窟以东，一部分达官贵人以及上层沙门在二期捐资开凿的龕像，其造像风格和题材内容，受I期主要洞窟的影响，分布于昙曜五窟内，一度打破了昙曜原初的窟内设计，大约此期龕像主以能在昙曜五窟内开龕供奉为幸事，这种情况，延续至二期的后半段，当昙曜五窟内的空余壁面差不多占满，同时19窟西胁洞续雕工程，16窟主尊改雕工程

完成之后，由皇室组织，在昙曜五窟进行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营造，即II式千佛的雕凿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昙曜五窟的窟外，没有11窟外壁岩面那样的小龕零乱分布；同时，II式千佛的分布，贯通于昙曜五窟，这种工程，只能由皇家统筹规划），因此，可以说昙曜五窟的整个设计，至此才全部完成。

北魏佛教与世俗政治结合紧密<sup>⑩</sup>，沙门宣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sup>⑪</sup>，利用君权来扩大佛教的影响。而北魏统治者则“令沙门敷导民俗”<sup>⑫</sup>，利用佛教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sup>⑬</sup>，因此，北魏佛教与世俗皇权，带有明显的相互利用的功利主义色彩。

文成帝即位元年，即诏有司雕造石像，兴光元年（454年），又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造五尊释迦立像，各长丈六，都用赤金二万五千金。“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sup>⑭</sup>，即今洛阳龙门宾阳三洞。这几次蠹耗大量民力财力的造像活动，都由皇室出面组织，对于佛教界，它达到了依国主而举法事的目的，对于北魏皇室，它可以借助佛教造像向广大人民形像地宣扬君权神授，北魏神权与皇权的互相利用，在佛教造像活动中也明显地表露出来。

和平初年，昙曜在武州山开凿的五所大窟，虽然没有明言是为太祖以下五帝所开，但北魏皇帝毕竟不是政教合一的教主，他们仅仅是利用佛教而已。据汤用彤先生研究，北魏信佛诸帝，《释老志》虽言其礼敬佛法，“但确于佛义有研求者，北魏终当推孝文帝”<sup>⑮</sup>。于佛义并无深究的帝王对于外来宗教的奖挹，本身就更能说明北魏皇室对于佛教的利用关系。北魏皇室扶持昙曜开凿如此巨大的工程，应是兴光元年为太祖以下五

帝铸五身像活动的一次翻版，只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和造像方式的差别，昙曜在开窟活动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如以三世佛为主，宣传佛法永存无绝的思想。

昙曜五窟既为太祖以下五帝所凿，17窟主尊是交脚弥勒菩萨，16窟主尊是释迦立像，17窟当是代表尚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16窟代表开凿时依然在位的文成帝，这两个皇帝情况与前三帝不同，因而16、17窟的主像、也与18、19、20窟有别<sup>⑨</sup>。至于这五座窟的排列，最初有可能是按照昭穆制的原则设计的。北魏皇室对昭穆制度十分重视，这在史籍中不乏记载，如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唯当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难言。夫生必有终，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绪，若宗庙之灵，获全首领以没于地，为昭穆之次，心愿毕矣。必不可豫，设可垂之文，示后必令迁之”<sup>⑩</sup>。因此，按世俗的昭穆制排列五窟，存在着这种可能。19窟是五个窟中的中心窟，已如前述，19窟代表开国皇帝拓跋珪，18窟代表明元帝，20窟代表太武帝，按昭穆制，16窟应当在20窟之西，现在21窟的位置上，找不到一期开凿的痕迹，这可能与昙曜五窟开凿的时间上略有早晚有关。从现存遗迹看，五个窟的开凿，虽然都在一期，但时间上略有早晚，这当然不是说一个窟开完以后

才开凿另一个窟，而是时间上有所交叉，19窟开凿最早，其次是18、20窟，19、18窟的开凿未遇到石质带来的问题，但20窟开凿时，这个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并最终导致20窟大面积的崩塌、因此，有可能16窟选在现在的位置上，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即对原来的设计有所修正。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19窟所显示出来的各种中心地位的现象。

- ①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力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
- ② 宿白《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9年第20卷。
- ③⑦⑩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④⑪~⑬ 《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 ⑤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本文部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4年。
- ⑥ 刘景龙《龙门石窟保护》，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9月版。
- ⑧ 刘慧达《北魏石窟中的三佛》，《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 ⑨ 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 ⑩ 李治国、丁明夷《云冈石窟开凿历程》，《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
- ⑪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十四章，《佛教之北统》。
- ⑫ 《魏书·礼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责任编辑：李力）